

偏爱清白菜根香

古代绘画中的白菜

于园媛

白菜之名，平淡无奇，似乎看不出惊人之处。但典籍中记载，白菜古称“菘”，其名可谓雅致，其节不失高雅。据《本草纲目》记载，根据宋代陆佃所著《埤雅》云：“菘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今俗谓之白菜，其色青白也。”

小小的白菜，虽然没有传统国画中梅兰竹菊“四君子”的高规格“待遇”，但仍受到很多画家的青睐，在传统画史上留下了别具一格的风采。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野蔬草虫》图，传为宋代许迪所绘，体现了画家精妙的摹写能力。画面左下方为一棵茎叶舒展的白菜，上面飞舞着蝴蝶和蜻蜓，一只蝗虫正在悄悄靠近蔬菜，而菜叶边缘已经显现出被虫子咬噬的痕迹。无论是叶面上青白两色分明渐变的纹路、叶子边缘的虫洞，还是昆虫的翅膀、须脚，都刻画得精微写实。

在细细描绘一棵寻常蔬菜的过程中，画家似乎把对于自然与生活的热爱都倾注其中。画蔬菜的生气，更是画茁壮昂然的生命之力。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幅约为元末明初时期所画形似白菜的蔬菜图，根茎雪白，茎挺拔，叶茂盛，虽有黑白灰色，但呈现出绿意盎然、郁郁葱葱的气氛。这幅画仿佛从菜园中一只蚂蚁或草虫的视角出发，令一株白菜呈现出参天大树般的妖娆身姿。明代沈周所画的《蔬菜图》亦有如此神韵。本幅属小景式构图，以淡墨勾勒菜梗，花叶和筋脉则浓淡墨相参，中间一枝菜茎挺拔而出，上面结满丰盈的菜籽。全幅简洁质朴，右上题诗一首：“南园昨夜雨，肥胜大官羊。党氏销金帐，何曾得一尝。”在画家眼中，雨后的白菜味道胜过“大官羊”，把握权势的党氏之人在金帐中怎么可能尝过这种美味？体现了作者豁然豁达的胸襟。

沈周非常喜爱白菜，留有多幅白菜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幅《辛夷墨菜图》卷，第一段绘辛夷花，第二段绘白菜一棵，画中运用干笔的飞白、水墨的渲染和重笔浓墨的点写，将普通普通的白菜表现得栩栩如生。在画家眼中，一株长于田畦土壤的白菜，拥有着与绚烂枝头花朵一样的盛放生机、灿然的生命。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明代陶成绘《菊花白菜图》，亦是白菜与时令之菊花并列成卷。右段绘秋末时节菊花盛放，左段绘高岗上的杂草中一株白菜迎风展叶，恣意生长。画中原叶如针，势如荆棘，而浓淡墨点染、皴擦之间绘就的白菜，拥有了与秋菊一样傲然斗霜的姿态和品质。

无论是饮食传统，还是精神寄托，白菜在画家的蔬果图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幅清代顾洛所画《蔬果图》，品种多样，色彩缤纷，有竹笋、玉米、莲藕、荸荠等等，画页中间位置画一幅白菜，翠绿鲜嫩，惹人喜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吴昌硕的作品《花卉蔬果卷》，画有春夏秋冬四季景物，与春花、夏荷、秋菊等并列的，是冬季丰腴的大白菜、红艳艳的萝卜。画家把白菜画得肥大饱满，连根须都用重墨绘出，仿佛还带着泥土，生活味十足。白菜萝卜图之下，吴昌硕又乘兴题诗一首：“花猪肉瘦每登盘，自叹酸寒不耐食。可惜芜园残雪里，一畦肥菜野风干。”短短几句，可见画家风骨。

于平凡处见不平凡，在萧瑟的日子里寻一份清淡可人的甘甜，这也许就是白菜的魅力。寻常烟火气、餐边蔬菜香，水墨氤氲之间，让内心安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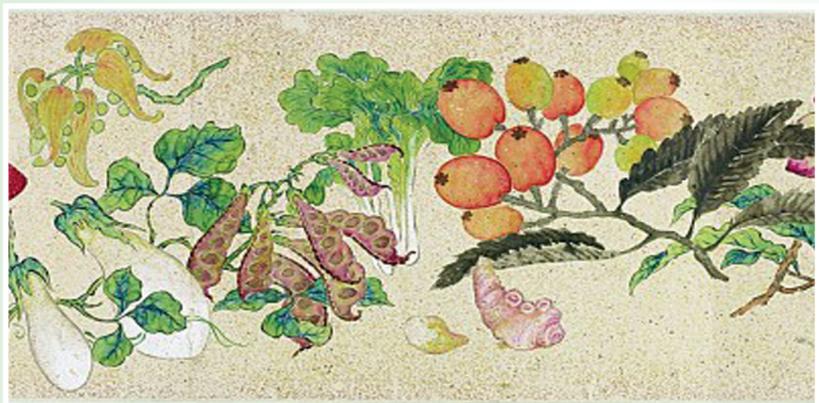
蔬菜图(中国画) 沈周



三蔬图(中国画) 钱选



野蔬草虫图(中国画) 许迪



蔬果图(中国画) 顾洛

我看我说

因势利导

徐荔

《史记》载：战国时期，魏国联合赵国进攻韩国，韩向齐求援。齐王任命田忌为将军，孙臆为军师，带兵进攻魏国都城大梁。交战中，孙臆对田忌说，魏军凶悍勇猛且轻视齐军，“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于是，齐军用逐日减灶的办法，制造逃亡的假象，然后设伏歼灭了追击的魏军，大胜而归。“因其势而利导之”后被简化为成语“因势利导”，意思是：顺着事情发展的趋势，向有利的方向加以引导。

势，形声字，《说文解字》注：“盛力权也。从力执声。”“执”意为“在高原上滚球九”，与“力”联合起来表示“高原上的球九具有自然往低地滚动的力”。势的本义是“手滚球九所产生的力量惯性趋向”，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形势、情势、趋势等义项。

势是事物发展的客观反映，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决定了事物走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能不能顺应形势、因势利导，考验着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大禹治水之所

以能取得成功，秘诀就在于他对“势”的分析和研判，在治水中没有逆势去“堵”，而是顺势去“疏”。《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取势就是要善于观察时势，看清趋势，然后因势利导、占得先机。北宋名臣张咏在任崇阳知县时，当地“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经过调研分析，张咏意识到茶叶的生意难以长久，便下令拔茶植桑。几年后，官府果然改茶法，其它县的百姓苦于茶租，独崇阳县以缴纳税，受茶租影响最小，生活安定富足。张咏预判时势变化，先谋先动，百姓从中受益，对他尊崇有加，“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时势不同了，人的思想也要主动调整、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变通，这样才能顺应时势，切合实际。如果“势”变了，人却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其情形无异于“刻舟求剑”，只知死板地从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找剑，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功。

《商君书·禁使》有云：“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飞蓬这种草本植物能飘千里，借的是风势。同理，一个人要成就大业，也要乘势、应势。时代的发展进步，为个人施展才华、竞展风采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舞台，这就是有利之“势”。当今青年人恰逢其时，当乘势而上、策马扬鞭，把个人奋斗的目标融入到民族复兴的洪流中。

“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要想种好粮食，就要遵守农时；要想治好国家，就要因势而为。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部署，推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在深刻体察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突破思想束缚，观大势、想大势、谋大势，顺势求变、谋势而动的成果。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当前，机遇和挑战都有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立足新形势，遵循历史前进逻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善谋、善思、善为，唯有如此，才能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于变局中开新局。

寻花易安词

戴思悦

宋词浩浩如海，李清照的词是其中一朵闪亮的浪花，李清照字易安，她的词独有自己的风格，在宋词史上称为“易安体”。易安词善白描，能炼字，李清照后沉郁，擅用花为象，以花态抒心绪。百般红紫散于易安词中，只得一路漫漫一路拾，一路寻花一路觅。

易安词中出现最多的花是梅花，或整或缺，或开或落，皆咏之。年少时她以梅自况“此花不与群花比”，写自己如梅般雪里缀琼枝；李清照与金石学家赵明诚在汴京喜结连理，回到青州家乡后所憾“二年三度负东君”，所欣“红梅些子破，未开匀”；恐梅为风所催“更欲折来，插入多销臂”，更是爱极了梅。

与诸多咏梅词人不同，易安咏梅只“抒”不“颂”。《玉楼春·红梅》作于易安晚年流落江南之时，不写梅之盛开，不言梅之傲雪，由含苞直转衰败，足见词人心态之衰，即便如此，易安仍“要来小看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清人朱彝尊以此句为易安词“得此花之神”者。易安未着

墨于梅之形之态，是以己之感抒于梅，非借梅喻己。易安自己就是梅，写梅不因其高洁，只因与自己命运相似、心性相投。

菊花也是易安极偏爱的花，绽放于秋天，凋谢于严寒，似是风所摧，难免含忧，所以这一意象常出现在她南渡之后的词作中。“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有家国之念又有身世之叹。值得注意的是，易安之词虽然低沉却不颓丧，“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呈现出一种洒脱的气质。

易安一生颠沛流离，愁苦之情于其词中展现无遗，而这种愁苦却不会引人消沉，反而给人以一种坚强感动的力量，“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着意过今春”，“负东君”本应愁怨，但她却不再回头，而是望着前方，只希望过好眼前“今春”，其中乐观豁达与坚强自不必多说。

海棠与梨花皆为易安记忆之花，因为这两种花都出现在易安南渡前的实景中和南渡后的记忆里。“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何等惬意，充满了少年时的婉美灵秀，非用力者所能及；后来“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与郎君阴阳两隔，其中悲苦在回忆过去美好时光时尤甚。由“梨花欲谢恐难禁”的闺中愁绪，到“能留否？酸醲露尽，犹赖有梨花”的追忆，易安总是能以三言两语就触动读者的心。

不同于“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家情壮志，也不同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淡然，更不同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神圣不可侵犯，易安之花皆发于自己，来源于自己，非以花喻己，而是以己喻花，这种别出心裁，反而显出词人自身的底气。

易安一生，便如同她笔下的各色繁花，盛开过，美艳过，为人追捧过，零落成泥过，独守风华过。既无子嗣，又中年丧夫的她，连续经历了多重沉重的打击，经受了只身飘零、颠沛流离的痛苦却能保持坚强勇敢，对国家有着深刻的热爱，忠贞热血不输男儿。易安的婉约背后，其实是一份“固执”，固执地坚守心中的信念。

为何是“一壶浊酒”

——诗文中的“浊酒”意象

陈勋 王洁群

“一壶浊酒喜相逢”“潦倒新停浊酒杯”“浊酒一杯家万里”……在传统诗词中，“浊酒”是一个频繁出现而让人难以忽视的意象。从唐宋词到明清诗歌再到近代诗歌，时有“浊酒”出现。何谓“浊酒”，它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有哪些意蕴，在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农耕时代，随着生产力提高，粮食除了满足人们日常饮食需要，已经有了富余。人们在“果酒”基础上，开始用谷物酿酒。用黍和稻等糯性较高的原料，经过蒸煮，加曲发酵，最后压榨酿造的谷物酒呈黄色，看上去较为浑浊，通常没有经过过滤和沉淀，里面存留部分酒渣，因此被称为“黄酒”或“浊酒”，在唐诗中，“浊酒”还有“蚁浮”“浮蚁”“醪”等别称。浊酒的酿造工艺简单，相对寡味，一般百姓家庭即可酿造，陆游诗有“农家腊酒”，即浊酒。与“浊酒”相对应的则是“清酒”，它选用小米、玉米等黏性小的粮食酿制、蒸馏而成，酒精浓度高、糖分少、色泽相对清透，饮用时无须过滤。酿造清酒的工艺复杂，清酒醇香甘冽，价格不菲，在古代通常为贵族享用。

在甲骨文中就有了“酒”的记载，《周礼》则是较早记录“浊酒”的典籍，《周礼》将酒分为“五齐三酒”，其中的“五齐”是相对于清酒而言的“浊酒”。酒最早用来祭祀，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文化意义附着其上，最后形成一种酒文化。众多文人参与到酒文化的构建和推介过程，其中，浊酒作为一种意象，比起清酒更代表一种大众趣味和平民气质。诗歌中的“浊酒”也更易为读者所熟悉，诸多带有“浊酒”意象的诗歌因此成为文学经典而被广泛传播。

最早让“浊酒”一词为人们所重视并不断引用的，应该是

陶渊明。陶渊明一生嗜酒，在诗文中多次提到“浊酒”，如“何以称我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十九》），在陶渊明的诗中，“浊酒”体现了他安贫乐道的精神追求。

唐代以后，“酒”的意象更加频繁进入诗文中，渐渐成为一种表达个人情绪的独特寄托。纵观唐代诗歌，其中最典型的是诗仙李白，他最喜用酒的意象，比如“兰陵美酒郁金香”“金樽清酒斗十千”。其中的“清酒”，不仅彰显出李白张狂奔放的生命力，还体现了他浪漫豪迈的人生态度和诗学风格。

但显而易见，诗人更喜欢写“浊酒”，以此来表达经历困境后孤苦郁闷的情绪。比如白居易在《快活》中写道：“可惜莺啼花落处，一壶浊酒送残春。”杜甫晚年名作《登高》，“艰难苦恨

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写出了晚年杜甫的落寂与困顿。苏轼在《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有道：“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陆游更是在诸多诗词中运用“浊酒”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情，他在《杂感》中写道：“一杯浊酒即醺然，自笑闲愁七十年。”还有“浊酒闲倾不满瓶”“但有老盆倾浊酒”“浊酒未倾心已醉”等。后人将杨慎的《临江仙》添加在《三国演义》的开头，其中“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表达了一种经历世事沧桑后的豁达。李叔同在《送别》一词中，用“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表达对友人依依不舍的情绪，“浊酒”与“别梦寒”共同营造了一种孤寂的氛围。

清酒和浊酒都可以表达个人情绪，但浊酒被赋予了一层沧桑的意味，这份沧桑道韵的厚重，传达了诗人忧国忧民之

思。杜甫的“潦倒新停浊酒杯”和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杜甫诗中“浊酒”出现频率高，如“浊酒陶令”（《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苍苔浊林中静”（《漫兴九首·其六》）。“浊酒”与杜甫“诗史”的定位，和他悲天悯人的思想与忧世伤生的心绪正相匹配。在范仲淹的诗词中，虽然只有一句“浊酒一杯家万里”出名，但它名气很大，而且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相得益彰。

杜甫与范仲淹的诗词基本奠定了诗人通过“浊酒”表达家国情怀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后世得到继承。清末梁启超有《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满船沉睡我彷徨，浊酒一斗神飞扬”，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拳拳之心。近代秋瑾在其《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中写道：“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表达的则是她希冀各位有志之士群策群力救国图存的家国情怀。由此观之，这些寄寓作者情感的“浊酒”，体现了他们对家国的深沉情感，表达了他们大济苍生之志。

可以说，中国诗酒文化中的“浊酒”意象，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生相伴，诗人在创作诗文之时，将“浊酒”意象融入其中，从而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使得带有“浊酒”气息的文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氛围，既表达一种个人情绪，也呈现了一种家国情怀，从而使得诗文逐渐经典化。个人命运的坎坷，国家命运的起伏，通过诗歌中的“浊酒”意象得以呈现，个人情绪和家国情怀在一壶“浊酒”里相逢，酝酿发酵，形成沉郁顿挫的诗文风格和深厚凝重的家国情怀。而这些文学作品，以“浊酒”为纽带，形成一种经典的中国美学风格，传承至今，影响深远，值得我们深入思考。